

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农民思想教育*

——以1957年农民社会主义教育为例

高巍翔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1957年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考虑,在农村开展了以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方面提高了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巩固了合作社,对解决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党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过分严重估计的背景下发动的一场群众性政治运动,因此,不可避免地蒙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色彩,成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先导,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关键词: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工农关系

中图分类号:D42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4.018

在1957年的开门整风中,大量的批评意见涉及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工农差别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看待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以此为中心内容,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帮助广大农民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弄清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是大非问题,认清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独立富强和共同富裕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的道理。

一、农业合作化是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客观需求

农业合作化不仅是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且是农业必须适应国家工业化步骤的客观要求。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社会经济中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工业的恢复和新建设项目开工,要求商品粮和其他工业原料的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的增产能力非常有限,不能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在“一五”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经济建

设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1955年,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部分仍占很大的比重,约为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0%左右,轻工业产值的80%左右。1953年、1954年农业生产因受灾而歉收,导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由1953年的30.3%下降到1954年的16.3%,1955年再降至5.6%^{[1]218}。这证明农业生产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工业生产增长的快慢。

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改造我国的个体农业,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增加农业产量的办法虽然有很多,但就我国初期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与可能来看,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还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陈云指出,在我国农业现有的条件下,“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1]339}。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农业生产的经验也表明,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到30%^{[1]198}。实行农业合作化后,各种增产措施更容易见成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农

收稿日期:2013-03-10

作者简介:高巍翔(1965—),男,湖北省蕲春县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党建研究。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10199)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大大加快,到1956年底,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在广大农村建立起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亿万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发展道路。

但是,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自然会引来一些矛盾,加上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规模较大,管理困难,分配不公,不习惯集体生产劳动,以及农民头脑中固有的私有观念,导致合作社并不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困难。

与集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相比,合作社内部的私人经济却发展迅速。广东省曲江县犁市乡沙园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私人经济发展超过了集体经济占据主要地位。1956年,合作社分红2.4万多元,社员私人经济收入有4.6万多元。1957年夏收分配,合作社分红1.9万元,社员私人经济收入有3.6万多元。按社员户计算,全社219户中,1956年全年社员私人经济收入超过其总收入50%以上的占70%户,1957年上半年估计有65%户,其中46户富裕中农,几乎都是以私人经济收入为主,私人经济收入多的竟占其总收入的90%^{[2]15}。四川省内江县四合乡不少干部群众想弃农经商。合作社干部要求辞职的26人,占10.3%^{[2]21}。由于社员热衷于私人副业生产和从事商业投机活动,参加合作社的劳动时间就减少了,合作社经济遭到严重的削弱,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都搞得很差。合作社面临着垮掉的危险。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的社员户占到了30%。46户富裕中农中,80%不愿意走合作化道路。虽然有一半的社员基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对合作化有所不满^{[2]17}。

1957年,在开门整风期间,一些知识分子、党外人士以及部分农民认为“合作化搞糟了”,“合作社不如单干好”,否定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鉴于农村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严重地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必须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民中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坚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首先,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业产量变化情况,帮助广大农民和乡社干部认识合作化的优越性。党组织通过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农业合作化所取得的成就,对广大农民普遍进行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意义的教育,使农民认识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是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虽然摆脱了封建剥削制度,但由于仍然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既缺乏采用现代技术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提高农业生产的能力,又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果不走合作化道路,农民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状态,过上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在合作化优越性教育中,各级党组织运用大量事实来回答合作社比“单干”好。例如,1955年夏收,全国保留的65万个农业社中,有80%以上增产^{[1]234}。从全国来看,1956年是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全国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但全国粮食却增产150多亿斤,达到3855亿斤,比丰收的1955年增产了4.8%^{[1]360};约有80%的农业社,75%的农户在不同的程度上增产和增收,体现了合作化的优越性。全国农业增产,除了国家支援外,最主要的是依靠合作化带来的集体力量,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抗御和减轻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

其次,通过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水平的对比,说明集体化道路的优越性。根据湖北省统计局的材料,湖北省农民的收入1956年比1952年增长了44.64%^{[3]12}。1957年上半年,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查了具有一般代表性的13个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情况:1956年每人平均纯收入是76元,比1955年的人均纯收入67元增加了9元。1957年,湖北省安陆县县委调查了一个情况一般的合作社城南乡胜利一社,抽查了各阶层有代表性的10户社员的生活情况,1956年与1948年、1955年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收入分别增长了154%、44.7%。1956年与1948年比较,农民人均消费的粮食、食油、肉类、布料分别增长了83.8%、50%、130%、106%^{[3]22}。河南省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收入增加比较显著。根据河南省对91个农业社的统计,1956年每户平均净收入是294.35元,比1955年增长4.75%,平均每人是61.32元,增加了6.83元^[4]。从全国情况看,1949年农民的纯收入约为42元,1956年约为66元,增加了75%。全国农民大体上有20%到30%的人过着略有积余的生活,60%左右的人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只有10%到15%的人生活有

困难,需要国家和集体救济^{[5]73}。农业合作化后,由于农业的较快增长,加上市场物价稳定,1956年,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消费水平提高了14.6%^{[1]363}。

二、统购统销政策是为满足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需要

如何正确看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是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内容之一。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我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紧缺的现象。粮食供需矛盾和供求矛盾在建国之初就很尖锐,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粮食供求紧张的矛盾更为加剧。为稳定市场,解决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基本满足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保持社会稳定,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历史地看,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在我国实现工业化初期是一个适合当时需要的积极举措。“实施这一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稳定,对于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1]229}。

但是,当时部分农民却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不满。四川省内江县四合乡在大鸣大放提出的意见中,以粮食问题最为突出。对粮食有意见的人,占到参加鸣放人数的90%以上^{[2]16}。其它地方情况也大体如此。统购统销政策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它的目的是保障全国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使国家早日完成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任务。这样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策,引起了一些农民的不满,他们集体隐瞒产量,少报收入,多报损失,以达到少卖余粮,多得统销粮的目的。这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粮食增产了,国家统购粮食的数量在下降,统销粮食却在增加。从全国看,1956年全乡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平均达到845斤,平均增产15.44%,但只完成70%的国家征购任务,比1955年实际完成的征购任务减少了22%^{[2]19}。1956年,粮食产量较1955年有所增加,但国家征购所得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少了39亿斤,国内市场销售的粮食比上一年度增加了127亿斤。1957年这种趋势仍在发展。毛泽东对此

指出:“最近几年350亿斤征粮和500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他预计:“如果850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6]543}

农民瞒产私分,原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农民进行这方面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了解宏观情况,也不大了解历史情况,更不了解统购统销政策是与自己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的,因而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对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表示不满。为此,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党对农民进行了统购统销政策的教育。

首先,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全局说明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是适合我国实现工业化需要的积极举措。第一,它是保证我国实现工业化的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既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必然选择和必要条件,也是人民生活富裕幸福的基础。在我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农业多提供一些积累,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农民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一定的奉献和牺牲,多为国家生产和交售粮食,忍受一定时期的经济生活上的困苦。第二,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能使城乡广大人民合理分配粮食稳定粮价,并通过粮价的稳定来稳定其他物价,使全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不但吃饭穿衣有了保证,而且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到粮食和其他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和物价波动之苦;第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国家掌握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调动和调剂,改变过去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在地区和年度之间购销不平衡的局面,从而保证工农业生产的顺利发展;第四,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可以从根本上排除私营批发商在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方面的垄断,加强国营经济与农民的联系,打击囤积居奇对农民的剥削,加强城乡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

其次,帮助农民认识当前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基本状况,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增长速度赶不上需要的增长速度。一是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一方面农产品虽然有了很大的增长,另一方面,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基本建设投资1953年比1952

年增长83.7%，工业总产值增长30%，城市人口和就业人数也大幅度增加。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1952年提高15%，比1952年增长9.3%。居民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5%^{[1]225}。粮食消费量大增，一般农民的粮食消费量也增加了，不仅要求吃饱，还希望家有余粮，发展副业生产。二是解放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导致我国粮食非常紧张。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粮食增加4.2%，人口也增加了2.5%以上。1957年粮食计划总产量4100多亿斤，人口却增加了1500多万^{[7]9}。这是导致我国粮食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

再次，帮助农民分析所谓粮食不够吃的思想原因，引导农民树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观。在农村关于粮食问题的辩论中，粮食究竟够吃不够吃是一个中心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通过引导农民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启发农民正确认识粮食够不够吃问题。在辩论中，许多农民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现在各地规定的口粮标准，不但够吃够用，而且还有一些剩余。四川省内江县四合乡农民就440斤的粮食定量标准，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进行过辩论。农民算生产、需要、存粮和缺粮账；算节约用粮与浪费粮食的对比账。结果，农民普遍承认，440斤粮食，如果注意节约，不仅够吃，而且有节余。据395户社员自报统计，余粮户占42.5%，足吃够用户占47%以上，两者相加，占90%以上；由于吃粮无计划因浪费粮食致缺粮的占9.8%^{[2]19}。在帮助分析农民所谓缺粮的思想问题时，还教育农民树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观。我国现在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人均粮食只有600多斤，这其中包括口粮、种子、饲料、工业用粮、出口粮食和国家必要的储备等^{[7]7}。支持工业建设用粮，实现国家工业化，最终是要使我国农业生产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大幅提高粮食产量，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现有农业生产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只能节约用粮，不能过分要求吃饱吃好，过高过快地提高自己的用粮标准。

通过教育，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较大提高，推动了粮食统购任务的完成。河南新乡地区经过大辩论，“在粮食战线上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首先是巩固了统购统销制度，广大群众认识到了统购统销的好处”^{[8]53}。据新乡地委对310个农业社的了解，通过教育，农民卖出夏季余粮318万斤^[9]。舞阳县通过大辩论，“辨明了粮食问题上的

大是大非，……初步克服了不少农民在用粮问题上脱离当前生产水平的过高要求和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不少干部从思想上认识了私分对国家建设和巩固合作社的危害性，有力地推动了夏季征购工作的顺利超额完成”^[10]。从全国来看，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教育，大大强化了农民的统购统销观念，自此以后，就很少发生农民闹粮事件。

三、巩固工农联盟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治保证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治基础。根据当时的实际和历史条件，我国工业化的战略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这一发展战略，在基本上没有外部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国民经济内部首先是工业内部的积累。同时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有相当一部分资金积累要来源于农业。农业积累方式除了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外，还需要对工农业产品价格采取“剪刀差”的方式，使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但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直接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一些人对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提出了批评意见。部分农民由于不了解城乡工农生活差别的原因和道理，也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有意见。这个问题如果不进行解释和说明，不仅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也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基于此，党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

首先，帮助农民正确认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长期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差别仍然存在。我国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虽然建立起来了，但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表现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是一笔“历史遗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不是在建国后才有的现象。建国前，城市和乡村都有富人和穷人。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工人、农民相比，悬殊非常大。以湖北省为例，1936年约占农业人口9%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农业

净产值的 26.7%，绝大多数贫、雇、中农及其他劳动者，只占有全部农业净产值的 73.3%；1936 年农民(含富农)平均每人消费水平是 49.73 元，地主每人平均消费水平是 174.32 元，是农民平均消费水平的 3.5 倍多^[3]。这种计算如果包括高利贷和其它不易确切计算部分，地主与农民生活悬殊则更大。建国后，经过党和国家的努力，工农、城乡生活水平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差距虽然存在，但有所缩小。以 1956 年为例，全国农民户均收入 300 多元，职工年均工资 610 元，相差 1 倍左右^{[8]24}。工人、农民的生活虽然都不算好，但总的说来，工人的生活相对农民要好一些。但农民的生活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和改善。和解放前相比，过上了较好的生活。1936 年，全国农民人均消费水平 61.2 元，1956 年上升为 81 元，消费水平增长率为 32.4%。全国职工人均消费水平，1936 年是 130 元，为农民的 2.12 倍，1956 年上升到 179.6 元，为农民的 2.17 倍，工人消费水平增长率为 38.2%。表面上看，工农消费水平差距有了扩大，但工人和农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率基本接近。这说明，解放后工农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提高的比例相差不大，都增长了 30% 以上。根据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调查的有代表性的 6 个合作社的 614 户社员的生活情况，1956 年，吃穿用有余的占 39%，‘‘三足户’’占 46%，尚有困难的仅占 15%^{[3]11}。而这些困难的农民基本上得到了国家和合作社的帮助，解决了困难。

由于我国还处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工业不仅不能反哺农业，而且还需要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因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在生活水平上存在差别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会根本改变。同时由于工人、农民生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建国后工人和农民在生活上虽然有差别，但还处于合理的范围内。

其次，通过综合算账对比，具体说明工农实际生活水平相差不大。看待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能仅从绝对货币数字进行比较，应该综合考虑工农生活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果仅从工人、农民的实际货币收入数字看，工人每月收入几十元，农民每年收入几十元，似乎是‘‘悬殊过大’’。但是，第一，当时工人每人每月几十元工资，是全家的收入。而农民一年几十元收入是每个人的收入。据洛阳拖拉机厂对 28 户职工生活水平的调查，其中一个属于中等户的五级工人尚廷建，每月收入 65.5 元，全家 5 口

人，每人平均 13.1 元。河南鲁山县幸福农业社的一户社员魏保全，全家 6 口人，1957 年预计收入 700 元，平均每人每月 9.38 元^[4]。考虑到城市生活费用比农村高出 1 倍以上，该户农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比该工人要好得多。据河南省的调查，在农村维持有吃有穿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需 5 元即可，在城市过同等生活水平，需要 10 元^[5]。第二，农民消费品 60% 以上是自己生产的，而工人却需要购买全部的生活品。以湖南攸县大兴农业社社员李裕芳和北京橡胶厂木工宫庆堂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宫庆堂的生活开支高出李裕芳 1 倍以上。经过综合分析，两者生活水平的差别并不大。李裕芳生活开支相当于北京 728 元，只比宫庆堂 750.72 元少 22.72 元^{[7]31}。

城市消费品综合物价与农村对比，农民的消费品综合物价相当于城市的 76.66%。如果直接对比，职工每人平均消费额为 150.38 元，农民每人消费额 84.64 元，职工高出农民 65.74 元，职工为农民的 177%。如果扣除城乡消费品差价因素 35.1 元及城市特殊生活条件的支出 9.48 元后，职工每人平均消费额只有 105.8 元，比农民高出 21.16 元，职工为农民的 125%^[11]。这说明工人、农民之间的差别不大。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分析，工人、农民生活水平差别的客观情况是：一部分工人比农民生活好，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差不多，有一部分农民比工人生活好。总的来看，工人生活水平比农民生活水平要高些，但是合理的。

再次，根据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工农收入水平、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别具有合理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人们收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劳动，取决于创造财富的多少和对国家贡献的大小。从工人、农民对国家对社会创造的财富的贡献来进行比较，工人生活水平比农民生活水平高一些，具有客观必然性。根据河南省 1956 年的统计，河南省工人平均每人的净产值为 1 407 元，农民全年劳力每人平均净产值为 164 元，工人创造的价值为农民的 8.58 倍，即一个工人相当于 8.5 个农民所制造的价值。农民大约以自己的生产总值的 30% 交给国家，70% 归自己，工人以自己的生产总值的 70% 交给国家，只有 30% 归自己^[4]。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当时，我国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每年大约只创造不到 200 元的净产值，而每个现代工业劳动者平均每年大约创造 3 000~4 000 元的净产值^{[11]94}。

工人能够创造出比农民更多的净产值，原因

在于,一般来说,工人比农民文化程度更高一些,掌握的技术也比农民一般要复杂,劳动强度也比农民的简单劳动要大,工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比农民多。从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情况看,主要部分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这些事实都说明工人比农民创造的价值要大,对国家的贡献要多,工人比农民的收入多一些,符合“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因而是合理的。四川省内江县四合乡农民认为,甘蔗每万斤才100多元,而糖每斤却卖6角多,是糖厂在剥削他们。对此,当地党组织组织农民到当地参观糖厂和铁路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一些农民说:我们原来是不了解工人生活的实际情况,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这么大的差距^{[2]15}。山西省一个农业社社员,平时总认为工农联盟是农民吃了亏,是农民养活了工人。当他参观某个工厂以后,主动算了一笔账:他去的那个工厂一个工人一年创造价值1.3万元,90%以上都交给了国家,个人的工资报酬只占他所创造的价值5%多一点;他们合作社去年平均每人创造价值130元,上缴给国家的农业税只有8%,个人所得却达到90%以上^{[7]31}。

总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生活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产技术落后,首先是工业生产落后,不能满足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要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消除工农生活水平的差别,根本途径在于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首先支援国家工业化的任务统一起来。通过教育,弘扬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中,广大农民掀起了农业生产的高潮,而这也成为即将不久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的发轫。

四、教育效果与基本评价

1957年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从总体上看,是健康的有成绩的,不仅巩固了农业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而且激发了广大农民支持工业化建设的积极性。1958年8月,中共中央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五亿农民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政治觉悟愈来愈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或只顾本队、本社、本乡、本县的本位主义,已经大大削弱了;城乡协作,工农业协作,大公无私,互相支援的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行动,已经大大发展了”^{[12]451}。通过教育,解决了统购统销政策和工

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所引起的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差别有所扩大的思想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却被大大地激发出来,热情普遍高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棉花等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条件,广大农民掀起了1957年冬的农业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和积肥运动。

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此评价是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基于“三农”的立场者,质疑其合理性;站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立场者,认为它是客观环境的产物,称赞其客观意义。

本文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于这个最高利益。其实,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整个进程看,农业的“牺牲”精神,换取了我国工业的大发展,缩短了我国工业化进程。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工业开始反哺农业。本世纪初,我国不仅取消了统购统销政策,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而且对农民种田实行直接补贴。到2009年,我国只用了短短的60年,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伟大跨越,完成了发达国家通常需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梦想,不仅甩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逐步走上国富民强的振兴发展之路,并且跨入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1957年的农村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教育所起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据一些学者估计,1952—1990年间我国农业通过剪刀差方式为工业化提供了高达8708亿元的资金积累,平均每年223亿元^{[13]60-64}。

由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党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估计的背景下发动的一场群众政治运动,这场教育运动不可避免地蒙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色彩,加重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是在合作社是否具有优越性的辩论中,片面夸大了其优越性,掩盖了农业合作社中存在的由于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规模较大,管理困难,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根本问题;

掩盖了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并将农业集体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对立起来,对农业合作社中一些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状况的有益探索,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了严厉批判。二是在教育方式上错误地将“大辩论”等于“大民主”,并没有深入细致地解决思想问题,甚至出现了对部分农民群众进行批判斗争的现象,加重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三是错误地将富裕中农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导致广大农民形成了不能致富冒尖的共识,加剧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这场运动实际上成为党错误地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先导^{[14]478}。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2]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资料:第3辑[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
- [3]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 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二)[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 [4] 《河南日报》社论. 谈谈工农生活[N]. 河南日报,1957-09-26(1).
- [5] 劳潜居. 农业合作化有没有优越性[G]//企业职工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资料.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
- [6] 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7] 时事手册编辑部.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提纲[M]. 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7.
- [8] 罗平汉. 当代历史问题札记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9] 中共新乡地委.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R]. 1957.
- [10] 中共舞阳县县委. 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批运动的初步总结[R]. 1957.
- [11] 学习导报社. 社会主义教育讲话:第3分册[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
- [1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13] 冯海发,李薇. 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J]. 经济研究,1993(9):60-64.
- [14]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易明)

Research on the Ideology Education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Road: the Farmers' Socialistic Education in 1957 as an Example

GAO Wei-xiang

(School of Marxism, WUT, Wuhan 430070, Hubei,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1957,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eveloped significant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s that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the policy of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workers and peasants' relations are practiced as the core contents in rural areas. On the one hand, this Movement has improved the socialist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adres and the peasants, consolidated the co-operative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olving the state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of grain and other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the Rural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was in the context of wrong estimation of situation and the party launched a political movement in the Anti-rightist struggle, as a result, it is inevitably overshadowed MOCC color and become the lead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leaving a unforgettable historical lesson.

Key words: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road;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olicy of monopoly for purchasing and marketing; rel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